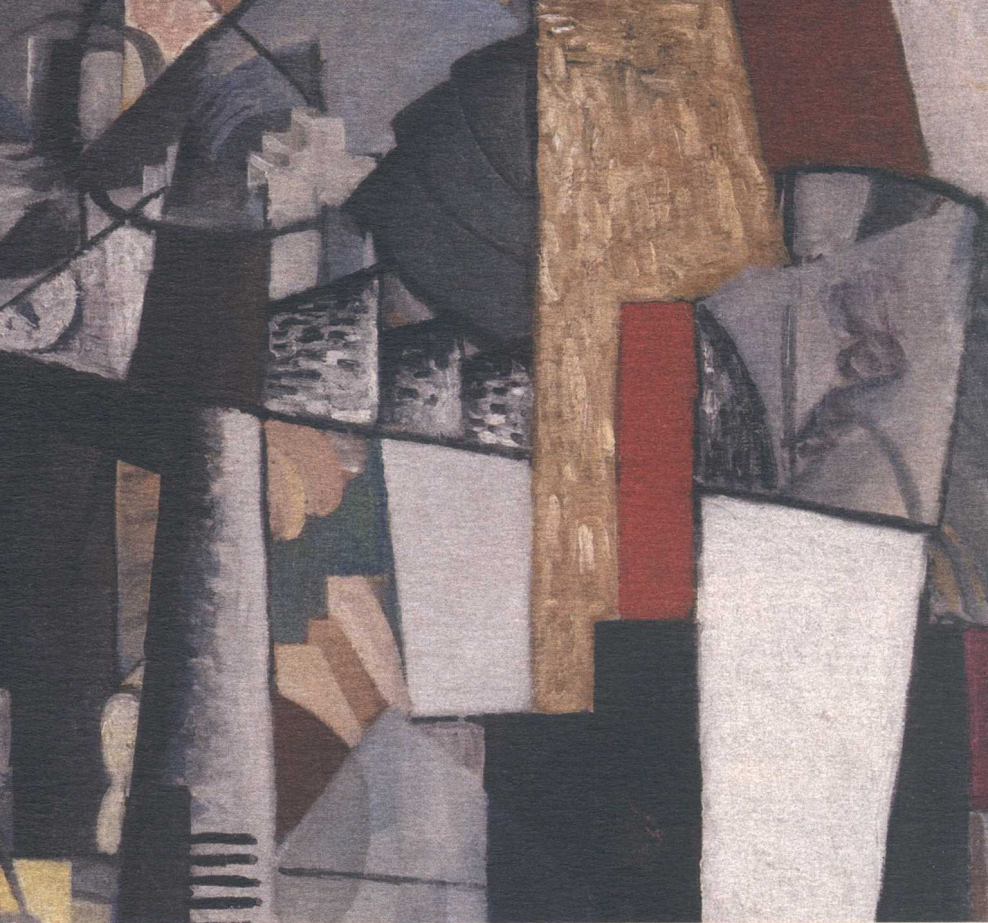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Edward Shil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社会的构建

[美] 爱德华·希尔斯 著 杨竹山 张文浩 杨琴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社会的构建

[美] 爱德华·希尔斯 著 杨竹山 张文浩 杨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的构建 / (美) 希尔斯著 ; 杨竹山, 张文浩,
杨琴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ISBN 978 - 7 - 305 - 16348 - 7

I. ①社… II. ①希… ②杨… ③张… ④杨…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9446 号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y Edward Shils

©198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6-28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社会的构建
著 者 [美]爱德华·希尔斯
译 者 杨竹山 张文浩 杨 琴
责任编辑 彭 涛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3.5 字数 235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6348 - 7
定 价 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 言

本书前三部分收录的文章虽然零散,但还是反映了一直以来我对于社会的基本构成以及思想意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总体看法。本书第四部分的文章也许可以看作对社会学编纂历史学方面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对前三部分为理解思想意识存在状态所作的努力之一。这种思想意识状态包括存在于个体、涵盖个体和超越个体的自我意识。本书前三部分的内容是关于社会构建是通过在其成员思想意识中形成社会形象来实现的,以及研究社会形象对权威的有效性和维持秩序所产生的影响。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知识分子通过严谨、系统的程序树立社会形象所作的努力。

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内写成的,文中的观点也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内渐渐形成的。这些观点也是我与芝加哥大学五十年合作的结果,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的合作。自从那个十年过去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参照着有幸在芝加哥结识的知名社会科学家的观点,重新阅读并且思考霍布斯(Hobbes)、滕尼斯(Tönnies)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作品,反复思考脑海中出现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在我从多种角度观察西方社会、亚洲社会和非洲社会的过程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这些观察反过来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得自那些知名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正是这些人给了我新的起点。本文集包含了这些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一些成果。

在介绍本书十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将会阐述每一篇文章是如何解决或弄清楚我刚开始动笔时脑海中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理解的模糊内容。为了这个目的,将这些文章按照写作的确切年代排列可能会更好,但这样做可能会打乱这部文集的主旨。

将每篇文章或一系列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整个社会学分析体系的大背景下,并且放在社会学崛起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样做也许会更符合我的初衷。但我没这样做,因为在我所研究的这种类型的社会学中,我还没有在最新掌握的文献中找到出发点。我主要通过四个途径获得社会学的大部分知识:一是通过大量广泛而且随意的阅读获得;二是研究特定的主题;三是不断研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作品;四是反思罗马帝国曾经拥有的凝聚力,以及后来出现的混乱状态。

在所有这些有时候会把我带入新领域的研究活动中,我一直关注着与新研究领域同样不太好理解的研究任务,有些情况甚至到现在都难以阐述清楚。这个任务就是分辨出大社会的有效构成。有些作家已经涉及市场在将互相不知道存在的个体融入大致有边界的秩序中所起的作用。其他作家涉及的是在有边界的领土上建立异化秩序时权威发挥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是通过使用法律、权力和实行强制统治实现的。我与这两类作家没有太大的争议,他们的观点具体到每一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都是以设想一个社会存在为前提,而这种社会是由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机构和领土,以及他们的附属部分构建的。这些附属部分并不是思维的主观状态。拥有附属部分的个人不会形成一个独立存在的集合体,而是形成一种通过行动充分表现出来的联系紧密的个人思维模式和结构。个人思维的个体间结构是这些作家们预设的假定。那些主张市场是社会构成要素的人预先假设了有效权威的存在,而那些主张权威和权力都是社会构成要素的人则预先假设:居民生活在有边界的领土上,行使权威或权力的人宣称统治这些居民。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到没有信仰也能构建社会的程度。没有市场,权威和权力也不

能发挥作用。这些文章的主题,是对最初个人之间可认知、标准化的信仰结构的认识,以及对信仰遥远目标依附的认识,不是通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直接经历获得的,而只是通过象征符号获得的。

文章是按照下面的意图安排的。第一组文章论述的是构成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对于任何个人,甚至最有经验的人来说,社会成员太多,领土太广阔,以至于能直接了解到的只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和社会得以存在的一部分领土。这些文章描绘了我称之为社会构成中心和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的模式。第二组文章论述的是中心所具有的特质,以及由这些特质形成的社会形态。中心是人与人之间信仰一致的聚焦点。第三组文章论述的是信仰的管理者、传递者和解说者。最后一部分又回到了第一部分的主题,即具有认知意义的社会自我形象,它讨论的是社会学家如何通过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培育,严谨地、有组织地构建这种社会形象。

(一)

二战前,我就怀疑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评了。这些批评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瓦解”了,建议重建一个——礼俗社会(Gemeinschaft)。我尤其不敢苟同这样的言论,认为社会必须有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的包罗万象的、人人响应的“意识形态”(ideology)。同时,我认为社会必须拥有某种广泛接受的合法的信仰,其前提是与社会稳定不可分割的权威能够有效发挥功能,而且社会不会陷入人人对立的战争状态。如果社会机构允许权威或多或少地发挥有效功能,那么社会机构的合法性必须得到广泛承认。对我来说,对社会主要机构的看法一致,似乎并不排除对应该如何分配稀有物资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的不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是一个民意多元论者(consensual pluralist)。我早期对英国 17 世纪的宗教自由感兴趣,也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学术自由感兴趣。同样,我深信,宗教自由和学术自由都不会得以维系,只有在

一个民意自由(loosely consensual)的社会里,宗教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受惠者才能够接受自己的传统和社会成员的清规戒律。同时,如果民意管理者的目标在于兼收并蓄所有社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所有行为,那将会没有团体和个人的独立空间,也不会有出现缺点、难以驾驭,或者发挥创造性的空间。

1945年和1946年,我和莫里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集中了我们在二战期间的观察,写了一篇名为《二战中德意志国防军的凝聚力与瓦解》^①(The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的文章。文章涉及了中心权力的有限性,和次中心在维持一个巨大团体——如德意志国防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忽视德国士兵关于中心的价值观,这也是他们对德国社会的贡献,我们也没有忽视德国士兵对远离前线的高级官员们的权威的态度。当然,我们认为德国的武装部队不仅仅只是初级团队简单的算术之和。根据我们的推论,整体上隶属于纳粹国防军和德国社会的高级军官,通过中介者向低级军官和军士发布命令,再通过这种隶属关系,向下级作战部队,特别是勇敢忠诚的士兵发布命令。与其他人相比,士兵也是最“政治化的”,他们是纳粹国防军的脊梁。只要军队的脊梁强壮有力,军队就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战后十年,我继续研究早年我就感兴趣的民意多元论——尽管我不这么称呼。我想描绘出在更大的社会中,最小的个人初级群体(personal primary group)所处的地位。我希望更加清楚地定义由个人隶属构成的初级群体的特质,并且弄清楚为什么初级群体的特征不能够——像查尔斯·库雷(Charles Cooley)认为的那样——扩展成整个

^①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2, no. 2 (Summer 1948): 280–315. 多次再版,最近再版是在下面两本书中: *Center and Periph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344–348; Morris Janowitz, *Military Conflict: Essay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War and Peace*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shers, 1975), pp. 177–220.

社会的主要特征。这就导致我深入研究作为情感原始依附场所的个人初级群体,和作为不同意识形态(ideology)存在场所的不同政治派别。我不想将大社会分解为一个个初级群体。我相信,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依靠意识形态长久地维持下去。我也同样清楚社会不会沦为像市场一样,成为各种利益平衡的角逐场,也不会沦为强权统治的产物。作为社会构建的选择性理由或补充性理由,市场和强权也有局限性,这是很显然的,以至于我没有必要去反驳这一点。选择性理由,即爱和意识形态说明大社会的实际行为中也存在着有限地带。即使我否认强大的综合意识形态具有的功效性和持久性,但也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在提供情感依恋的强度上,在提供众多个人对民意自由的认知程度上,能说明爱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这些个人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也不自愿参与,就像他们对待不同政治和宗教派别一样。从1945年到1955年,我思考的大部分内容是努力去发现信仰的不同管辖范围,一方面是对超凡品质和物质的信仰,另一方面是依附于个人的信仰,或“意识形态”和“个人初级群体”之间的信仰管辖。这是我对早年感兴趣的民意多元论的重塑和深化。

直到战后第一个十年结束,我一直想去发现“礼仪”(civility)的平衡。一般来说,“礼仪”不是很强烈地依附于社会,它超越了个人原始依附的范畴。对于大社会,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礼仪并不要求垄断个人的忠诚,也不要求垄断个人的依附能力。我没有深入探寻礼仪的认知程度,这个疏漏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

1956年从印度回来之前,我所做的研究只有这些。本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是写于1956年之后。1946年到1955年,这一期间我关于这个话题的写作,主要是两部长篇手稿,一部是《民意和自由》(*Consensus and Liberty*),另一部是《爱、信仰和礼仪》(*Love, Belief, and Civility*)。在这两部手稿中我写下了我当时的观点,不过一直都没有出版。尽管如此,我还是出版了一篇关于《加冕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oronation*)的文章和另一篇《个人关系、原始关系、神圣关系与

公民关系》(*Personal, Primordial, Sacred, and Civil Ties*)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里有当时我的观点的总体轮廓。^① 在1954年和1955年,我还写了一本书,叫作《秘密的痛苦:美国安全政策的背景及后果》(*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② 书中我研究了因为意识形态要求民意的完全一致,造成了对民意多元论的破坏。但同时,我也赞同作为多元论的先决条件,民意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二)

本书的前三篇文章都是我从印度回来之后十到二十年内写成的。本书的第一篇《社会的一体化》(*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是最后写成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973年。这篇文章是我对1970年在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由我举办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的一系列反思。许多在西非和西印度群岛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的优秀人才参与了这次研讨会。《社会的一体化》解决了观察西非和西印度群岛上的新国家和社会联系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部落和当地社会形成社会的程度和形成的方式。这些部落和当地社会发现他们自己仍处在前殖民统治者们留下来的疆界内。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里,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有了这篇文章,因为同时我一直在研究印度以及非洲的黑人社会,而且也偶然有了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的计划。不过,它仍然代表了我对界定民意一致的客体和民意一致的结构所做的工作,这个任务在战前就已经占据了 my 的头脑。

①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n. s., 1, no. 2 (December 1956): 63-81,在《中心和边缘》中再版,在第135-152页;《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第二期(1957年6月):130-145,在《中心和边缘》中再版,第111-126页。

② London: Heinemann, 1956.

《社会和社会群体》(*Society and Societies*)(第二节)同样代表了我在 1955 年后十年里根据后来的反思和观察来处理先前所做的工作的成果。这篇文章受我 1955 年以后对印度研究的影响很大,也受我几年后开始的对非洲研究的影响。这篇文章研究广泛但不够深入,就像我 1955 年以后的所有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很自然地受到了我关于中心和边缘思想的影响,而中心和边缘的思想是我在研究印度之后才开始进行深入阐述的。

(三)

《大众社会理论》(*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第三节)写于 1961 年。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是我想回应大众社会的批评者。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批评大众社会的文字大多数面目可憎,因为它们出自势利的激进分子,其中不乏贵族气的自命不凡,也掺杂了源于马克思主义灵感的虚假平等主义。假如我去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会使我们的研究误入歧途。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率直和天生的偏见,我在几篇文章中都有所涉及。^①

在西方,劳动阶级比起 20 世纪之前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了各自的社会,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似乎有充分的证据。劳动阶级的“异化”,在过去甚至现在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到 20 世纪“异化”减弱了。现在存在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温和的礼仪相融合了。

现代西方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仍然是按照等级划分的。人类越来越多地在大型组织中工作。虽然政党间互相竞争,但是政党仍然是庞

① Richard Christie 和 Maria Jahoda 合编的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II: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4, pp. 24 - 29) 中的“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以及首次出版在 *Sewanee Review* 65, no. 4 (1957 年 10—11 月): pp. 586 - 608 中的“Daydreams and Nightmares”。后面的文章在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p. 248 - 264) 再次出版。

大的,领导、属下、官僚在政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工会力量增长,它们是对其成员拥有高度集中权力的大型组织。然而,人们似乎对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礼仪更加感兴趣,并且更乐意隶属于这种团体。在上层阶级里,在20世纪之前,当然也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可能有更多的礼仪。一直以来,人们只有更为广泛地接受社会分配制度,却少有抵制。对我来说,革命党派规模小,似乎更加证明了不同阶级已经融合,但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批评者们宣称这些阶级完全被上层阶级异化和掌控了,被引诱相信了“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被强制屈从于上层阶级。被具有优越感和有独创性但是也有错误理论的知识分子们所藐视的“大众社会”,结果是一个比原先声称的民意自由社会更为趋同的民意自由社会,尽管它距离完全一致的民意自由社会还很远。我关于大众社会的文章的主要论题,大部分基本上是形成于我关于中心和边缘的距离正在逐步缩小的新观点。这也是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分析的复杂现象。

(四)

《中心和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第四节)是我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这些在本书中得到了部分展现。这一阶段中,对领袖人物感召力(the charismatic)的研究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地位,这一阶段和它之前的以及之后的阶段重叠在一起。这个阶段的主题首次出现是在我的论文《加冕的意义》中。此文是我和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1953年初夏合作完成的。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观点,即一致的信仰集中在中央机构,包含了对领袖魅力和道德美德的信仰。当我思考在印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时,这些观点愈加明朗,虽然在研究印度的过程中,我还没有清晰地形成这些观点。我首次想到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是

在我研究“大都市”和“省”之间理性关系的时候。^①我试图理清对引领现代印度知识分子生活的规范所做的大量观察。我当初想到这个问题时,感觉就像是在观察英国知识分子文化和印度作为一个主权国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期间的现代印度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所觉察到的这个关系和我不久前所研究的英国学术生活中大都市和省之间的关系是相类似的。当我根据这些新观察重新阐述这个关系时,我就明白了知识分子的大都市和省之间的关系模式,无论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只是更为普通的关系等级中的一个例子。^②现在清楚了,更普通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社会之间和同一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也适用于同一社会之内、不同社会之间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宗教和道德信仰的运动。^③它也适用于行为模式的运动,以及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运动。

1957年夏天,在华盛顿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举办的研讨会上,把领袖品质归结于中心的观点向我展现了新的视角。当时,我还坚持认为亚洲和非洲新兴国家中的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能够通过社会主义的措施来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发言期间,我思考为什么这些政治家和管理者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唯一具备这种必要资格的人,而他们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是“被救赎”的对象,原因就在于他们将领袖人物具有

① 对“大都市”和“省”的反思始于1953年在曼彻斯特时,这些反思在关于二战前后英国知识分子的论文中被首次提出,此篇论文在1954年冬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关于社会思潮的一个研讨会上提交。(那些有学问的听众反映无法理解这篇论文。)这篇论文经过修改后发表于 *Encounter* 4, no.4(19)(1955年4月):1-22;再版在 *Th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s*,第135-153页。

② 我关于这个主题的首次出版物写于1956年或1957年。这篇文章出现在 V. M. Dandekar 和 N. V. Sovani 合编的 *Changing India: Essays in Honour of D. g. Gadgil* (Bombay and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第275-294页;此文在《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中再版,第355-371页。

③ 关于中心和边缘的更加综合的叙述出现在1958年秋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举办的圣诞节会议上;这篇文章刊发在 Donald Roy 主编的 *Trends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第64-84页。经过大量修改后此文又出现在 *The logic of Knowledge: 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Polany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第117-130页。

的品质归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这些观点源于他们关于种姓、伊斯兰君主、帝王、酋长的信仰传统,也源于离他们更近的传统,即对科学或准科学知识的占有。这些知识能使它们的占有者参与到更高层次的活动中。他们认为,他们从古至今的中心地位赋予了他们“非凡”的力量。宗教领域里的领袖魅力,和政府经济政策领域里的领袖魅力几乎相同。在演讲过程中,这些观点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之前我的文章中还一直没有出现过它们。^①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一次又一次研究马克斯·韦伯关于领袖权威的观点。但直到大约二十五年后,当我涉及和马克斯·韦伯观点表面上距离很远的实质性话题时,我才感觉到这些观点的延伸潜力。一方面,在我“发现”之后所说的一切观点似乎明显“包含”在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另一方面,在我更早的研究中,直到开始研究社会阶层时,才有如此清晰的表述,而马克斯·韦伯还没有用这些术语阐释过这个话题。

《感召力》(*Charisma*)、《感召力、秩序和地位》(*Charisma, Order, and Status*)、《尊卑》(*Deference*)这三篇文章(第五、六、七节)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写成的。这些文章都是从马克斯·韦伯“感召力常规化”(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的主题衍变而来的,我将之重新阐述为对感召力的扩散和稀释(更近的时候,我想如果增加一个关于感召力短暂性和持久性的时间范畴,那样会更好)。根据对领袖现象的重建,我能够看出民意一致的一个内容是将领袖共同推向社会的中心。中心本身也许高度集中,或者在极端不可能的事例中,在一个完全、真正的民粹民主社会里,中心也许会被扩散,以至于和社会本身融合在一起。从

① 写这篇文章起初是为了研究对亚洲和非洲经济效率的态度。后来我将这个主题拓展成既包括节约行为,也包括效率。文章以思考传统与理性的对立开篇。这些国家中具有领袖权力的精英阶层所持有的信仰和他们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劳工的蔑视态度似乎都超越了传统。这篇文章的修订版后来在 *World Politics* 第二期中(1958年10月)以“魅力聚散:对欠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意义”为题出版;已经在 *Center and Periphery* 中再版,第405-421页。

20 世纪 50 年代初之后^①，我就开始研究民粹主义，但是在那些年里，我没有把领袖品质归结于人民大众。我当时并没有领会“民众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vox populi, vox dei)这句话的含义。

在《尊卑》这篇文章里，我拾起了我认为被实证派所忽视的关于社会阶层的老话题。最初涉及这个话题的时间大约是在 1938 年，我和赫伯特·高德汉姆(Herbert Goldhamer)合作了一篇叫做《权力和地位的类型》(*Types of Power and Status*)^②的文章。这是个难以把握的题目，很难用经验来处理。我认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像“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混合概念来处理这个难题。几代社会科学家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尊卑不像财富、收入、职业的分配——那是德国社会科学家过去称之为社会阶层的“客观标准”。尊卑是对信仰的认知和评估。赋予尊重和接受尊重的程度是与被评估人拥有某种特征的程度相一致的。这些被正确认知或不正确认知的特征，例如职业、政治权力、种族品质、个人成就和血统，既可能分别独立，又可以结合在一起，根据其与社会中心的距离和存在于社会中心的领袖魅力来评估。于是，我有了这样的观点，即，尊卑的赋予是归因于领袖魅力的变异形态。在这个方面，我得到当时在全美民意调查中心工作的保尔·海特(Paul Hatt)和阿尔伯特·莱斯(Albert Reiss)关于职业的社会地位所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也得到了此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研究成果的支持。

(五)

我对知识分子感兴趣，一定是和我对一个大社会的民意类型以及

① 初次以“民粹主义和法治”为题，发表在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Conference o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s* (1954 年 4 月)：91 - 107；后来在 *The Torment of Secrecy* 中出现，第 98 - 104 页。

②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no. 2 (1939 年 9 月)：171 - 182；在 *Center and Periphery* 中再版，第 239 - 248 页。

对至高无上的神圣秩序的兴趣有密切关系。然而,我花了许多年才开始觉察到其中的关系,并设法搞清了这些关系。尽管我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兴趣比其他的兴趣产生得都要早,但回想起来,似乎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都很零散,多年以后才集中起来。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之后,我相信革命思想的特征和温和、保守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特征是不同的。我不确定我在这方面的观点有没有受到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Ideologie and Utopie*)的影响,我是在 1933 年初读到此文的。但在稍晚时候,当我试图整理关于革命的观点,准备在罗伯特·帕克的研讨会上发表时,我脑中并没有曼海姆,尽管一年前才刚刚读过这本书。我的研究以对比共产党纲领和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党派纲领为基础,并且我大量参阅了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所办的报纸和杂志。

后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搜集到了关于“本土主义”(nativists)和芝加哥纳粹主义同情者的材料。我的印象很深刻,看起来对立的所谓“左翼”和“右翼”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模式却是相似的。两者都认为,“制度”正被一群人蓄意地、有阴谋地掌控,这群人使制度避开公众的耳目,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释。在写于 1953 年的《独裁主义的“左翼”和“右翼”》(*Authoritarianism “Left” and “Right”*)一文和写于 1954 年的《秘密的痛苦》(*The Torment of Secrecy*)一书中,我指出了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政治观点之间许多密切的联系。其共同的元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倾向。我后来继续对这一观点进行阐释。1955 年秋天,我写了一篇名为《意识形态终结了?》(*The End of Ideologies?*)^①的文章,文中我使用了特定的术语,这个术语我后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伯恩斯多夫(Bernsdorf)的《社会学词典》(*Worterbuch der Soziologie*)^②和《社会科学国际百科》(*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③所

① *Encounter* 5, 第 5 期(24)(1955 年 10 月):52-62。

② 合编。(Stuttgart: Enke Verlag, 1969)第 441-444 页。

③ New York: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 1968, 第 7 卷,第 66-75 页。

写的文章中作了更为充分的阐述(后者出现在第九节《意识形态》中)。但在1958年出版《意识形态和礼仪》(*Ideology and Civility*)一文时,当时一些学者都没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就像《意识形态终结了?》一文中所提及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被全面误解了一样。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英国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所有的文化和信仰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理解为对世界的一系列想法或一般性的看法,这个世界几乎只属于革命的工人阶级。在这个世界里,真相被伪造或歪曲,不公开承认对财富、收入和权力的兴趣,这或多或少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此我是彻底否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使用“意识形态”来表示工人阶级理想化的革命观,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综合的、系统的,是从这个“世界”异化而来的。它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并且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存。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尽管我认为它对工人阶级世界观的描述存在错误,但是它确实和我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是相呼应的。我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方面的差别在于我观察到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只有思想褊狭者支持(不管这些思想褊狭者来自哪个阶级),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也已被广泛使用,已不带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贬义,也不带有中上层阶级和不具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或者带有赞同工人阶级革命的含义,它已经被社会学家使用。社会学家希望,所有社会都有文化,文化传承信仰,不随意扩散信仰,在亲疏不一的信仰体系中,任何社会中的个人都不能放任自由。这种相互联系的信仰模式也被称为意识形态。我不反对这种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尽管我认为它夸大了社会文化的连贯性。它所指的内容和我认为的意识形态是相当不同的,它体现了社会学家们没有看清个中区别时的思想困惑。

我对知识分子其他方面的兴趣起初和我对意识形态的兴趣没有明显联系。我自己没有看出其中的联系,尽管我后来发现这个联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我的研究兴趣首先出于对文学史的研究,对文人谋生